



中國文化 發展史

总主编
龚书铎

秦汉卷

黄朴民 王子今
孙家洲 刘华祝 著

山東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國文化 發展史

总主编
龚书铎

秦汉卷

黄朴民
孙家洲

王子今
刘华祝

著

山東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发展史. 秦汉卷/龚书铎主编;黄朴民等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8—7931—1

I. ①中… II. ①龚… ②黄… III. ①文化史—
中国—秦汉时代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7985 号

总 策 划/陆 炎
责任编辑/陆 炎 王 慧
装帧设计/石 径

中国文化发展史

秦汉卷

龚书铎 总主编

黄朴民 王子今 孙家洲 刘华祝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31 印张
字 数: 5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7931—1
定 价: 77.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539—2925659

目 录

导论 秦汉文化发展脉络及其基本特征 / 1

第一章 动荡起伏的社会思潮 / 19

一、秦代“以法为教”的文化传统 / 20

二、从推崇“黄老”到“独尊儒术” / 26

三、儒学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 / 46

四、东汉中后期的社会思潮嬗变 / 62

第二章 秦汉区域文化 / 79

一、关中地区的文化领导地位 / 79

二、齐鲁文化的风格与儒学的西渐 / 84

三、天下之中：河洛地区的文化位置 / 90

四、滨海文化区与滨海文化 / 96

五、北边区的军事文化 / 108

六、江南文化的历史性进步 / 121

七、“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秦汉文化精英的区域分布 / 127

第三章 异彩纷呈的学术文化 / 131

一、经学的盛衰与今古文之争 / 132

二、讖纬的流行 / 156

三、史学的丰碑 / 167

四、兵学的建树 / 177

第四章 秦汉宗教与礼俗迷信 / 188

- 一、“天人感应”学说 / 188
- 二、封禅表演与儒学的神学化 / 200
- 三、数术文化与民间礼俗迷信 / 215
- 四、佛教的传入 / 232
- 五、道教的生成 / 234

第五章 秦汉时期的教育 / 239

- 一、秦代的“禁私学” / 239
- 二、官学的体系与特色 / 241
- 三、两汉私学的兴衰 / 250
- 四、师法与家法 / 254
- 五、察举制与教育 / 263

第六章 秦汉时期的科技进步 / 269

- 一、天文学的发展 / 269
- 二、秦汉数学经典 / 276
- 三、农学成就 / 283
- 四、中国医学体系的建立 / 286
- 五、纸的发明 / 293

第七章 璀璨的文学艺术 / 297

- 一、绚丽壮观的汉赋 / 297
- 二、缘事而发的乐府 / 311
- 三、雄浑壮丽的散文 / 328
- 四、令人神往的乐舞 / 345
- 五、风韵永驻的书画 / 352

第八章 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 363

- 一、从严夷夏之防到四海一体 / 364
- 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沟通 / 370
- 三、张骞、班超“通西域”的历史文化功绩 / 376
- 四、璀璨旖旎的外来文明 / 389

第九章 士人与社会 / 395

- 一、焚书坑儒的厄运 / 396
- 二、通权达变与白衣公卿 / 400
- 三、利禄之门与士林异化 / 409
- 四、独善其身与隐逸心态 / 418
- 五、崇拜皇权与保存自我的两难选择 / 434

第十章 社会风俗文化现象 / 441

- 一、家庭结构与妇女地位 / 442
- 二、游侠气质与复仇之风 / 450
- 三、丧葬习俗及其文化背景 / 461
- 四、服饰饮食与时代风貌 / 468
- 五、建筑风格与社会时尚 / 476

结语 / 482

主要参考文献 / 488

后记 / 492

导论

秦汉文化发展脉络 及其基本特征

秦汉时期（前 221 年—220），前后计 441 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得以全面确立与较大发展，以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经济持续进步、出现第一个繁荣高潮，大一统背景下各类军事活动频繁展开并呈现崭新气象的重要阶段，是中华文明嬗递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时期。与此相适应，这一期间的封建文化，也在继承博大精深、异彩纷呈的先秦文化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变化，充分的发展，为整个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演变创立了规模，规范了方向，明确了特质，奠定了基础。

按照学术界通常的分类方法，文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器物类、制度类、观念类三大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文化实际上就是这一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创始与确立阶段，其社会

经济运作机制、国家政治制度、国防安全体制、思想意识体系均打上了独特的时代烙印，呈现出博大的文化气象。这种时代精神和文化特色，概括起来，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秦汉文化是对先秦文化的广泛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任何时代的文化，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只能是在充分汲取前代文化成果基础上的新的创造，秦汉文化也是如此。作为秦汉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者，秦汉文化的形成，乃是对先秦时期辉煌文化进行借鉴继承的自然结果。无论是器物类文化，如建筑、服饰、兵器、农具等等，还是制度类文化，如职官、郡县、法规律令、祭祀等等，抑或观念类文化，如哲学、文学艺术、社会风俗、宗教等等，都是和先秦时期一脉相承的。例如，不论是秦朝推崇法家，提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还是汉初推行“黄老之治”，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思想资源都取自于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都是诸子之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诠释与合宜运用。又如秦汉王朝都实行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架构起以皇帝为中心的逐级管理的封建中央、地方行政大系统，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全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全面、有效控制，而这种政治文化同样渊源于先秦时期，是战国期间列国行政系统、政治运作所反映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基本精神在秦汉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是战国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地方郡县行政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俸禄制度、“玺”“符”制度、官吏选拔考核制度、爵秩制度的历史延续。再如秦汉时期人们所热衷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忠孝节义、大一统、德刑礼乐等等，其基本源头也一样肇始于先秦时期。由此可见，没有先秦时期的思想成果与文化积淀，就不可能有秦汉文化的恢弘格局与杰出成就；没有先秦时期所奠定和规范的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与价值取向，也就不可能有秦汉文化的健康发展方向。

第二，秦汉文化是全方位繁荣发达的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就制度文化而言，秦汉时期各种典章制度的建设业已十分系统而完备，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文化的基本格局。在政治上，自秦始皇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行政体制后，两汉社会大率沿袭，并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因革损益。这一体制的核心，是皇帝直接领导和控制下的中央机

构的三公九卿制与地方行政的郡、县、乡三级管理制，这样就确保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大小相维，内外相统，如网之有纲，衣之有领”^①。在军事上，这一时期逐步健全了军令虎符发兵制、将权临战授任制、部队统率分权制、军务管理多级制、军队布局制约制、军事行动监察制、兵役征发招募并行制以及军事赏罚功爵制等一系列制度，大致规范了封建军队建设、国防体制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在经济上，这一时期厉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政策，确立以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并通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封建租税、赋役、盐铁官营等措施、途径，使封建经济体制不断得以巩固和强化。在文化上，注重选择有利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学说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方针，在此前提下，建立起明堂、封禅、学校教育、文化管理等一系列具体制度，为封建政治、经济、军事的顺利运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就物质文化而言，秦汉时期也进入相当繁荣的阶段。这主要体现为：农业中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普遍推行，水利灌溉事业的不断完善；手工业方面纺织、漆器、冶铸、建筑等行业工艺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城市的进一步发达、货币的普遍流通和商业的日益繁荣；军事上，武器装备的日趋改善，钢铁兵器基本替代青铜兵器，以长城修筑为主要标志的军事防御筑城技术臻于高度成熟。物质文化的丰富和繁荣，既是秦汉时期封建经济长足进步的具体表现，更是当时制度文化全面发展、观念文化绚丽多姿的坚实基础。它为人们从事精神活动、开展精神文化创造，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社会分工变得更为合理，使文化嬗递获得不竭的生机和活力。

就观念文化而言，秦汉时期更拥有值得后人为之自豪的辉煌。社会思潮的跌宕起伏、异彩纷呈，诸子学说的此消彼长、各擅胜场，科技文明的迅速发展、成就卓著，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的交流融合、交相辉映，文学艺术的绚丽壮观、气象万千，社会风俗的多彩多姿、雅俗并存，共同刻画了秦汉时期观念文化全面兴盛的璀璨壮丽的图景。这在统治思想方面，出现了儒家的王道、道家的无为与法家的循名责实、信赏必罚三位一体的“霸王道杂用之”的文化精神；在学术文化领域，出现了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整合，以经学文化为具体表

^① 贺昌群：《论两汉政治制度之得失》，见《贺昌群史学论著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现形式的文化现象；在兵学领域，出现了以兵书整理、兵学流派划分和兵儒合流为主体内容的军事学术繁荣；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以铺陈摛文为特色的辞赋、以缘事而发为特色的乐府，而散文、乐舞、书画、文字学方面的成就同样为秦汉文化的长廊增添了光辉的篇章；在科技文化方面，天文学、历法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的全面发展，《九章算术》、《周易参同契》、《汜胜之书》、《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著述的面世，盖天、浑天、宣夜等天体理论的提出，表明当时的科技文化已进入新的水平；在史学编纂方面，出现了《史记》、《汉书》等杰出历史著作，使中国历史编纂学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至于一些深层次的文化观念，如天下观、民族观、审美观、价值观、心理、性格等等，这一时期更是有合乎时代条件的确立与发展。

上述情况表明，秦汉时期文化的发展是全方位、整体性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全面、系统而辉煌的，凡言中国文化史者，每每首推秦汉，当属事出有因，洵非虚文。

第三，秦汉文化是动态性演变的文化形态，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面貌，从而使其具有复杂多样化的性质。文化在动态发展中嬗递演进，这乃是文化自我更新的本质属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秦汉四百余年间，社会历史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附丽于它的文化形态自然也时时展现着新的风貌。在这里质的稳定性与量的多变性是有机统一的，内容的纯粹性与形式的多样性是和谐一致的。正是因为秦汉文化本身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状态之中，才使得其绰约多姿，生机盎然。

这种文化形态的动态性演变，在制度文化的建设中有鲜明的体现。如在政治体制方面，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是秦汉政治乃至整个封建社会政治的根本特点，具有质的极大稳定性。然而其具体表现形式，则在秦汉四百余年间不断有所调整 and 变化，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言：“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反映的正是这种稳定与调整的内在统一关系。具体而言，秦至西汉前期为比较纯正的中央三公九卿制与地方的郡县一体制。即中央以三公之职为重：丞相上佐天子、总理庶务，太尉掌全国军政，御史大夫察举朝廷遗失、官吏非法。地方政治如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教化之责，皇帝与朝廷则寄

重任于郡太守，以太守为吏治之本：“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① 这种政治体制，沿袭至汉武帝时而有所损益，这在中央政体上，就是丞相权力的相对降落、外朝执政角色的虚化和中朝的形成并在国家行政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至昭、宣时期而不变：“至昭宣之世，大将军权兼中外，又置前后左右将军，在内朝予闻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给事中者，皆自托为腹心之臣矣。此西京朝局之变。”^② 在地方，则设置十三部刺史以加强对地方的监察，刺史秩仅六百石，但“以卑临尊”，可以监临二千石守相，这显然属于加强君主专制的得力措施。至东汉初年，中央集权体制又一次在形式上得以较大调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③ 国家机要，遂转委于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④。在地方政体上，刺史的权力日益扩大，俨然有贬凌太守权益之势，到东汉末年，刺史已非为监察大员而开始拥有地方行政权和领兵权，“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若曩时司察之而已”^⑤。

显而易见，秦汉时期政治制度的核心——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基本性质虽稳定不变，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却始终处于调整变化之中，从中反映出制度文化的随时制宜、动态发展。其总的趋势是，君主专制的色彩越来越浓厚，皇帝个人的绝对权力越来越得到主观意图上的强化。

应该指出，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秦汉政治文化中君主专制成分的强化，并不等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完善。秦至西汉，中央以三公统筹大政，地方以太守为吏治之本，故能内外相应，轻重相倚，封建统治机制遂处于合理有序的状态。然而这种格局一变于武帝，再变于东汉光武、明、章之世，在中央中朝压倒外朝，大将军之权越居三公之上，在地方刺史之权越居太守之上，表面上是突出了君主个人的绝对权威，满足了君主控制一切的最

①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② 〔清〕钱大昕：《三史拾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③ 〔东汉〕仲长统：《昌言·法诫篇》。

④ 《后汉书》卷四六，《陈忠传》。

⑤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刘馥传》。

大愿望，实际上乃是打破了政治上大小相统、内外相维的合理格局，埋伏下使君权中衰、地方割据势力崛起的隐患，这样，就使得强化君主个人专制的初衷走向反面，成为动摇中央集权体制的动因。贺昌群先生指出：“汉末大一统帝国之解体，先由其政治机构之崩坏，而后有外戚宦官之擅权，外戚宦官之祸愈烈，政治上之破坏愈大，国家大权，逐渐由三公而旁落于刺史州牧之手，即由中央而转落于地方，形成豪杰割据之势。”^①这诚为笃评，揭示出制度文化的优劣得失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意义，也说明了中央集权是否成功的标志，不在于君主所拥有的个人权力大小，而在于相关制度的细密与合理，能真正起到大小相统、内外相应、轻重相倚、君臣相维的作用。

再如就经济体制和兵役制度而言，其在秦汉时期也处于不断的演进变化之中。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是作为超越社会的力量，调和社会的复杂矛盾，平衡社会的各种关系，使社会保持相应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基于国家的这一属性，秦汉统治者都致力于缓和地主阶级与广大民众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在经济上就是积极贯彻发展封建小农经济的指导思想，立足于建立“编户齐民”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从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汉武帝打击豪强地主，到师丹、孔光提倡“限田限奴”议、光武帝刘秀推行“度田”政策，均是为维护封建自耕农经济所做的努力。然而，地主阶级对土地、财富的极度贪婪和攫取本性，必然要使朝廷的初衷落空，导致土地兼并的加剧，民众的大量流亡，使社会结构基础由家庭演化为宗族，并逐渐出现宗族的豪族化。与此相联系，是封建兵役制度由郡县征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化。秦汉大一统帝国在军事上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致力于强兵，而强兵问题的实质乃是一个如何养兵的问题。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养兵的最佳途径无疑是贯彻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指导方针，而征兵制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最好体现者，它取兵于役，将当兵作为农民的一项义务，从而以土地为条件，耕战相结合，达到民自养兵的目的，既节省国家的财力，又能应付国防的需要。因此，在秦朝与西汉大部分时间里，征兵制一直成为兵役制度的主导形式。

但是，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到东汉时期却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这中间的原

^① 《论两汉政治制度之得失》，见《贺昌群史学论著选》，151～1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因虽然众多，但最为主要的则是土地兼并的加剧，导致民众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结果，农不著地，兵与农分，推行征兵制的基本前提已经消亡，这样便不得不以募兵代替征兵了。而募兵制的出现，标志着由民自养兵转变为由国家政府养兵。在平时，国家就需要支出大量的财力来维持它的军事力量，士兵则成了职业兵，而且效果并不一定理想，所谓东汉时期“每战常负，王旅不振”^①，就是当时募兵弊端的形象写照。当中央政府还拥有权威，能够号令四方时，这时的职业兵是依附从属于国家的；而一旦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严重削弱，对地方丧失有力的约束力量，则将骄兵惰的局面随之形成，职业兵很自然地依附于州牧及地方豪强，成为名副其实或变相的私人武装了^②。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军阀混战，皇权衰微，地方割据势力主导政局，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兵制上变兵农合一为兵农分离，募兵制取代征兵制，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它从一个侧面表明秦汉时期制度文化的嬗变是一个持续而广泛的文化现象，它在秦汉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打下了独特的烙印，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如果对秦汉文化的基本形态和递嬗轨迹进行哲理层面的深入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它演进的方向和动因、它价值的取向和判断、它属性的稳定和完善，都依从和听命于一种文化理性精神的规范和指导。这种文化理性精神，主要体现为政治文化上的大一统理念贯穿于当时文化递嬗的始终，哲学架构上的阴阳五行观对思想文化各个层面的联系与沟通，学术形态上的兼容博采、融合贯通三个方面。

第一，大一统的精神与原则是秦汉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历史命运。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中国历经五千年沧桑，国内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与融会，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始终如一，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越是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造成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而秦汉时期正是这种“大一统”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文化

^① 《后汉书》志二八，《百官五》注引应劭《汉官》。

^② 参见姚公骞等主编：《先驱者·前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大一统”的文化。

“大一统”的本义是以“一统”为“大”。“大”在这里是推崇或尊尚的意思；“一统”，即以“一”“统”之，所谓“总持其本，以统万物”^①。“大一统”就是高度推崇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也即对“一统”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也有人将“大一统”的“大”理解为形容词，认为“大一统”就是“大的统一”、“高度的统一”，即描绘、形容统一的程度与规模：“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② 其实两者的意思并无根本的区别。

“大一统”的具体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所丰富发展。在秦汉时期：其地理概念是指国土统一，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③；政治概念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即所谓“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时间概念是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即所谓“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④。到了宋代欧阳修、朱熹等人那里，又将“正统”说纳入“大一统”理论体系之中，强调“大一统”要以“正统”或“有德”者为中心，以弥补早期“大一统”说之不足。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已经初步形成了“大一统”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尔后，儒、墨、法等诸子学派对此均大力倡导和弘扬，如：孔子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主张“定于一”：“天下恶乎定？……定于一”^⑤；荀子热情讴歌和向往“四海之内若一家”；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⑥；法家鼓吹“事在四方，要在中央”^⑦；等等，就是他们关于“大一统”的共同心声。

①《管子·五行》尹知章注。

②〔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③《礼记·坊记》。

④《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⑤《孟子·梁惠王上》。

⑥《墨子·尚同上》。

⑦《韩非子·扬权》。

他们的宣扬和倡导，遂使得“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到了战国末年，终于在统一条件基本成熟的基础上，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变成现实，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祚虽然短暂，但继起的汉王朝仍为高度统一的强盛的封建帝国。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先后形成，遂使“大一统”的理念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实际。尤其当汉王朝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抉择之后，更使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获得了切实推行的基础。现实的需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丰富和深化，这就使《公羊传》作为儒家思想的主流占据了汉代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在当时，“公羊学”是儒家“大一统”理论的主要载体，它所主张的“王者无外”的“大一统”理想境界，为传统的“一统”观增添了新的内涵，使之发展到新的水平，使得“大一统”理论更加系统化、精致化，成为适合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最高政治思想纲领。

毫无疑义，秦汉时期的一切文化现象，都笼罩着“大一统”的时代精神。这其一是学术文化的统一。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为了维系“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这在秦代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西汉初年是尊崇黄老“新道家”，自汉武帝时代起，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思想上的整齐统一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其二是制度文化上的统一。这在秦代，是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地方行政体制等举措；在两汉，也是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赋税徭役制度、统一的军事制度、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统一的选官制度、统一的学校教育制度，即如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① 其三是民族观念上对“大一统”理想的追求，这在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中有集中的体现：“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

^① 《后汉书》志卷七，《祭祀志上》李贤注引应劭《风俗通》。

义，讥二名。”^①即四夷与诸夏地位平等，彼此和好相处，互助互补，民族关系上天下为一家。这是极其卓越的民族思想，也是秦汉民族文化观念的主流，它奠定了秦汉时期民族逐渐融合、国家高度统一的理论前提，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四是各类文化创造活动中对“大一统”精神的讴歌与弘扬。如以铺陈写物为基本特点的汉代大赋，在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扬雄等人的手中，以宏伟的气势、丰富的词汇、华美灿丽的文采，反映了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物产丰足、都市繁华、宫室壮美、统一强盛的大汉王朝的声威，美化皇帝的功业，歌颂国势的昌盛兴旺，从而热情地宣扬了“大一统”的时代主题，在文学创作中突出体现了汉帝国的文化精神。又如司马迁撰著《史记》，其初衷也是为了弘扬振奋“大一统”的时代精神，这一点其在《太史公自序》文中有充分的反映：“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可见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上就是为了“明圣盛德”，对“大一统”政治局面进行讴歌。

即使到了东汉后期，现实中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渐趋瓦解，天子不尊，法令不一，豪强崛起、诸侯割据的形势正在形成，儒家的“大一统”理想面临严峻的挑战之时，“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顽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仍受到进步思想家的肯定和提倡，如“公羊学”大师何休就认为，“大一统”“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为此，他汲汲于提倡“弱臣势”，“一法度，尊天子”，“重本尊统”，把维护中央权威，摆正君臣关系，稳定封建等级秩序与纲常名理，巩固集权统治机制作为在当时再造“大一统”格局的中心内容^②。由此可见，“大一统”文化精神对秦汉社会生活的指导与规范是贯穿于始终的。

秦汉时期思想家之所以普遍怀有“大一统”文化情结，既是因为他们致力于与现实中的“大一统”格局保持高度的一致，服务于具体的政治需要，也是

^①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② 参见黄朴民：《何休评传》，11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由于他们在观念深处完全肯定“大一统”为“天地之常经”，所以必须当仁不让，全力以赴进行弘扬：“《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一统”理念宛如一条红线，统辖着整个秦汉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堪称为秦汉文化的灵魂。

第二，阴阳五行思想是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

如果说“大一统”是秦汉文化发展的政治基础，体现着秦汉文化的时代主题，那么，阴阳五行理论就是秦汉文化发展的哲学基础，体现着秦汉文化的逻辑特征。换言之，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的构建及其表现形式是受阴阳五行理论的全面渗透与规范的，均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共同的精神图腾。

阴阳五行思想起源的时间，学术界的看法多有分歧^③。但其系统形成并产生政治上的重大影响，当在战国中晚期，而以邹衍学说的提出为主要标志。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这段文字集中表明了以下几点：第一，邹衍“闳大不经”的阴阳五行说，其本质上也是讲治乱的理论，“必止乎仁义节俭”，这就必然与秦汉时代政治思想的选择并占据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产生逻辑的联系。第二，邹衍的理论，有自己宏大严谨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中，宇宙间万事万物都互为依存，可以类推，以小验大，以大识小，是典型的天人之学。这一点，必然能给予秦汉时期诸家构筑“天人宇宙统一图式”时以大的启迪，提供哲学的素材。第三，邹衍的学说，充满荒诞不经的色彩，“怪迂之变”，“言机祥”，并多涉及渺茫不可深究的“天事”，素有“谈天衍”之称，

①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② 《汉书》卷七二，《王吉传》。

③ 参见顾颉刚、罗根泽等主编：《古史辨》（第五册）中梁启超、梁调甫、吕思勉诸先生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